

昨日的语文学：  
缅怀 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 教授<sup>1</sup>  
程炜 北大外哲所

1

去年 10 月 30 日有几位朋友分别发来 Szlezák 老师去世的消息，经过搜索才发现他其实是 28 日因突发疾病离去的。当时刚写完纪念 Michael Franz 老师的文章草稿，想到又一位留德期间相识的老师去世，无限伤神。只有忙碌的学期结束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些许时间回顾一下这位记忆中的学者。

2004 年 10 月，我初到图宾根，Szlezák 当时在古典系任希腊语教席教授（也在哲学系任兼职教授）。尽管久仰他的大名（所谓“图宾根学派”的代表），但由于尚未满足古典系的希腊语要求，还无法参与他主持的讨论班。而对于以 Szlezák 为代表的图宾根学派，除了知道这一学派发展了独到的柏拉图解释之外，我对其他则一无所知。记得 2005 年的夏季学期，我尝试去旁听他不预设希腊语知识的讲授课“柏拉图导论”，这时才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本人。他身材高而消瘦，吐字略微含混。当时的我尤其不太习惯他每句话音量逐步减弱的说话方式，因此这门课没参与几次就放弃了。

尽管没有实质参与过 Szlezák 的课程，但早期关于他的江湖传闻有两件我还记得。其一是他每年都在附近的修道院主持柏拉图阅读的小组，每次集中于一个对话录。当时的师姐告诉我，在那里你可以看看 Szlezák 亲密小圈子的构成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看看研读柏拉图的学生——至少在欧陆——的优秀程度。不同于鱼目混杂的哲学讨论班，这些人对于柏拉图的熟悉程度可以精确到 Stephanus 码的第几行，一些段落信口就可以引用。另一件传闻关系到 2005 年他在古典系开设的《奥德赛》讨论课。除了翻译和理解，Szlezák 本人非常重视史诗的吟诵，因此每节课课前，需要每个学生先到他办公室一个个通过朗诵，然后才正式上课（古典系的教室离他办公室很近，就在同一层楼的斜对面）。这让当时的我既憧憬，又有些畏惧。

由于 Szlezák 在本校的影响力，尽管没有选课，他关于柏拉图的作品仍旧成为我在德国最初一两年的阅读重点，分别是《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对早期和中期对话的解释》（*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Interpretationen zu den frühen und mittleren Dialogen*.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85），《读柏拉图》（*Platon Lesen*.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93）和当时出版不久的《柏拉图晚期对话中的辩证家形象》（*Das Bild des Dialektikers in Platons späten Dialogen. 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Teil II*.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04）。其中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的附录，其中对以伽达默尔（Gadamer）为代表的柏拉图解释的批判让我感到醍醐灌顶，记得一口气从晚上读到第二日天亮也毫无倦意。在留学的第二年，我就决定自行翻译他的《读柏拉图》，因为相比其他两本专著，这本书更具有普及性质，既能展现 Szlezák 独特的柏拉图解读路径，又不预设过多的学术背景。当时未曾想到，后来我与他的结缘也主要是由于这本书的翻译。

大概是 2007 年，我已完成了《读柏拉图》全书翻译，同时也成了古典系的正式学生（当时为辅修，后转为第二主修）。Szlezák 在 2006 年已经退休，只是偶尔会看到他回到古典系图书馆查书，这里也是我常常自习的地方。有次看到他在书架前看书，我鼓足勇气跟他搭讪，告诉他自己已经译完了他的《读柏拉图》，

<sup>1</sup> 感谢洗若冰、郑中华和王伟对于初稿的建议和修订。

发现少量引证问题，想跟他确认。他应该很吃惊忽然一个中国人说已经翻译完了这本书，而且还有问题请教，于是连忙跟我去书架取了这本书和柏拉图原文对照。大概很高兴这本畅销书又增添了一个译本，而且译者显得也比较认真，回答完我的问题之后，他直接表示要请我吃饭，并且从办公室拿出不少他论文的抽印本给我（当时他的接任者还没有到岗，他还保留着办公室）。饭间他告诉我他对中国印象很好，不仅他女儿在香港学习过，而且他特别强调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希腊哲学学者，Ludwig Chen！（按：即陈康，Ludwig Chen 是他后期的发表用名，他早期的外文发表署名为 Chen Chung-hwan）。

之后，Szlezák 一直关注这本书的出版，也多次给我邮寄他新近的论文，这甚至延续到我回到中国之后。因为他退休后搬回了维尔茨堡（Würzburg）居住，我们见面并不多。但如果他到图宾根参加活动，我们偶尔会小聚聊天。从那时起，他一直写信邀请我参与他举办的柏拉图阅读小组，我也才知道那个传说中的修道院叫 Heiligkreuztal，离图宾根并不远。但由于各种机缘不巧，我直到 2012 年才第一次参与这一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主题是柏拉图的《会饮》）。而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们主要是邮件往来。我自己甚至都没有想到在丢失了好几年信件的情况下，我仍保留有好几十封与 Szlezák 的邮件往来，其中他最后一次回信给我是 2022 年 1 月 3 日。

## 2

可以说，Szlezák 的去世代表着柏拉图研究领域中所谓图宾根学派的终结。自从 Hans Krämer 在 1959 年发表这一学派的奠基性作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德性》（*Arete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以来；这一学派经历了几十年激烈的论战（尤其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前五年），这十多年来在学术上的相关讨论已经归于平淡。此外，除了英年早逝的 Konrad Gaiser，这一学派的两位代表学者 Giovanni Reale 和 Hans Krämer 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去世，而最为年轻 Jens Halfwassen 也因为意外在 2020 年离开人世。关于 Szlezák 在图宾根学派内部的学术贡献，我在《读柏拉图》中译本的附录二已经有所介绍（或参修订版：“柏拉图释义问题”，《中国学术》（28），商务印书馆，2011，89-171），这里就不再重复<sup>2</sup>。事实上，《读柏拉图》一书也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一领域的一些独特见解和研究特点，尽管是以比较通俗的方式。因此，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这里或许更值得展现的是 Szlezák 在其他方面的学术贡献。

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正如他的姓所展示的，并非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于 1940 出生在布达佩斯，之后同家人移民到德国。他在 1959 年至 1967 年间在埃尔朗根大学（Erlangen）、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古典学、哲学和历史，并且于 1969 年在柏林工大获得博士学位。读者或许会对他的学术轨迹感到好奇，尤其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地点。事实上，与当年许多德国学生一样，Szlezák 早年也在多地游学。他在埃尔朗根和柏林工大主要是追随 Walter Burkert，是后者最早期的学生和助教之一。Burkert 1955 年博士毕业，而 1957 年以来，他一直在埃尔朗根大学任教，1966 年才在柏林获得他的第一个教授席位。此时的他还没有成为后来世界知名的古典学和宗教史巨擘，而仅仅是刚任教不久，甚至听众寥寥的学术新人。那时的埃尔朗根群星璀璨，既有历史学家 Helmut Berve，古典学家 Otto Seel、Alfred Heubeck 以及 Reinhold Merkelbach，也有哲学家 Paul Lorenzen。在博士阶段之前，Szlezák 主要辗转于埃尔朗根和图宾根两地，尤其受到任教于图

<sup>2</sup> 需要承认，这篇少作集中于 Szlezák 的正面贡献，但缺乏对其立场足够的批判性反思。

宾根的 Wolfgang Schadewaldt 的强烈感召，起初主修哲学的他才打算将古典学作为终身的志业。而另一方面，他与 Burkert 处于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当后者拿到柏林工大的教席席位，并且表示希望 Szlezák 同去一边读博一边担任助理时，Szlezák 毅然离开了图宾根，接受了 Burkert 的邀请。

这一决定更像是出于对友人的支持而非单纯的学术考量。因为当时的图宾根是德国战后与汉堡并立的两个古典学重镇（分别由 Wolfgang Schadewaldt 和 Bruno Snell 坐镇），而柏林工大才刚刚开始大规模新建文科，古典学的建设更是几乎从零开始，面临生源和图书等多方面的困境。甚至其文科扩建也不完全是基于学术的考量，而更多出于柏林当局对自由大学过于左倾的不满，试图以新机构冲淡整个西柏林人文社会科学的左翼导向。与单纯的学术人 Burkert 不同，柏林时期的 Szlezák 受到当地左翼氛围的强烈感召，积极参与左翼学生运动；与此同时，他也利用柏林其他机构的文献资源，相当高效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最终在 1969 年，他以研究伪阿基塔斯论范畴的文本获得了博士学位，这部论文在 1972 年以《伪阿基塔斯论范畴》为题出版（*Pseudo-Archytas über die Kategorien. Texte zur griechischen Aristoteles-Exeges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1972）。同时，按照他的自述，他对于左翼运动的热情也因为 1968 年华约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随着布拉格之春的终结而终结。而随着 1969 年 Burkert 拿到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教席，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 Szlezák 也同导师一起到了苏黎世<sup>3</sup>。

Szlezák 博士论文中的阿基塔斯（Archytas）来自 Tarentum，与 Philolaos 并称早期毕达哥拉斯派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 Philolaos 的学生。他被柏拉图的《书简七》提及，据说与柏拉图有密切的交往，亚里士多德甚至写过比较柏拉图《蒂迈欧》与阿基塔斯哲学的专论。阿基塔斯的作品基本已经失传<sup>4</sup>，但由于他在学派内外的重大名声，有大量托名伪作问世，其占据了 Thesleff 1965 年收集毕达哥拉斯派伪书的约 20%<sup>5</sup>，包含理论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多个领域，其中 Szlezák 研究的就是归于他名下对于范畴的讨论，这在古代被一些学者视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前身<sup>6</sup>。我并不清楚这一选题是否受到 Burkert 的影响。Szlezák 曾经自述，Burkert——正如大部分德国教授——对他的辅导并不多。甚至在提交博论前，Burkert 仅仅与他讨论过部分文本校勘问题，而对论文的主体部分全然没有加以过问。不过我们知道，Burkert 最初的名声就来自于他对毕达哥拉斯的研究，即他出版于 1962 年的埃尔朗根大学教职论文《智慧与科学：关于毕达哥拉斯、菲洛拉奥和柏拉图的研究》（*Weisheit und Wissenschaft: Studien zu Pythagoras, Philolaos und Platon*. Nürnberg: Hans Carl, 1962）<sup>7</sup>。在这本书中，他挑战传统，力证原始毕达哥拉斯派更多是一个萨满崇拜的宗教团体而非哲学学派，而所谓毕达哥拉斯派哲学更多来自柏拉图学园以降对于传统的改造和重塑<sup>8</sup>。这一离经叛道的看法如今已经成为毕达哥拉斯派研究的权威观点，该专著也成为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毕达哥拉斯专著，被称为这一领域的圣经。事实上在这本专著外，Burkert 同一时期的发

<sup>3</sup> 值得一提，尽管柏林工大的一些文科方向迄今仍旧可圈可点，但其古典学方向则的确昙花一现。两德合并后，工大取消了古典学专业，并且将相关的图书转给了洪堡大学，这也是在洪堡大学的古典学藏书中能看到很多工大藏书章的原因。

<sup>4</sup> 新的残篇收集参：C. A. Huffman, *Archytas of Tarentum: Pythagorean, Philosopher and Mathematician King*. Cambridge, 2005。

<sup>5</sup> H. Thesleff,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ythagorean Writings of the Hellenistic Period*, Åbo: Åbo Akademi.

<sup>6</sup> 其他伪作参 S. Giani (ed.), *Pseudo Archita, L'educazione morale*, 1993; B. Centrone (ed.), *Pseudopythagorica ethica*, 1990。

<sup>7</sup> 本书之后有修订英译本 *Lore and Science in Ancient Pythagoreanism*, trans. Edwin L. Minar, J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其经典地位主要被英译本所奠定。

<sup>8</sup> 对这一叙事的挑战可以参 L. Zhmud, *Pythagoras and the Early Pythagore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表也显示出他对伪毕达哥拉斯学派作品的浓厚兴趣<sup>9</sup>。因此，Szlezák 对伪毕达哥拉斯哲学作品的研究选题很难说没有受到 Burkert 的影响。

当然另一方面，伪阿基塔斯论范畴这一选题也预示了 Szlezák 长期以来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关注。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伪书大多数产生于公元前 150 年到公元 100 年的罗马和亚历山大，其作者通常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的哲学资源将毕达哥拉斯哲学包装为某些后世“先进”理论的首创者和先行者<sup>10</sup>。伪阿基塔斯对范畴的讨论主要见于三个来源和年代不同的文本，分别为《论普遍概念》（*peri tou katholou logou*）、《十种普遍概念》（*katholikoi logoi deka*）<sup>11</sup>和《论对立》（*peri antikeimenōn*）。Szlezák 主要关注的是前两个文本，因为第三个文本仅有少量残篇传世<sup>12</sup>。《论普遍概念》有两个版本流传，一个是以希腊共通语（*koinē*）形式流传的全本，另一个是多利亚方言主导的残篇，辑佚自新柏拉图主义注家辛普里丘（Simplicius）。虽然前者派生自后者，但保存更为完整。与之相对，《十种普遍概念》的文本证据则出现较晚，只有 Demenico Pizzimenti 于 1561 出版的印本和 16 世纪的抄本 *Vaticanus Ottob. Gr.153*（275<sup>r</sup>-281<sup>r</sup>）。

Szlezák 的博论不仅收集了关于《论普遍概念》的古代证言，提供了导言、注释和索引，而且首次以平行对照的方式呈现了这一文本的两个版本。这相比于 Thesleff 1965 的混合两个版本的早期尝试是一个重要进步，使得二者的异同变得清晰。同时，他也论证这一文本应该写于 Andronicus 之后，因为它追随 Andronicus 将《范畴篇》第 10-15 章分离出来（这一部分被称为 Post-Predicamenta），并且在内容上有多种迹象表明它是对第一代《范畴篇》注释者的回应。而针对《十种普遍概念》，除了译注之外，Szlezák 则论证本文与《论普遍概念》并非出自同一作者，甚至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晚期古代的作品，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在本书的附录部分，他报告了论文完成后的一个新发现，即《十种普遍概念》实则依赖于编纂于 1040 年的拜占庭哲学手册《哲学辑要》（*sunoptikon suntagma philosophias*），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前文将其断为文艺复兴时期伪作的论断。

### 3

到达苏黎世之后，Szlezák 的研究更集中地转向柏拉图和柏拉图传统，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普罗丁努斯学说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Platon und Aristoteles in der Nus-Lehre Plotins*.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79）之中。这本专著的读者不多，因为他并不直接讨论和分析普罗丁的努斯学说，而是利用这一学说考察普罗丁的哲学方法，尤其是他与柏拉图的关系。敏锐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

<sup>9</sup> 1961, 'Hellenistische Pseudopythagorica', *Philologus*, 105: 16-43, 226-246; 1972, 'Zur geistesgeschichtlichen Einordnung einiger Pseudopythagorica', in *Pseudepigrapha I*, Fondation Hardt Entretiens XVIII, Vandoeuvres-Genève, pp. 25-55.

<sup>10</sup> 一些新近的讨论，参 R. Chiaradonna (2019). The 'Pseudopythagorica'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A discussion of Angela Ulacco 'Pseudopythagorica Dorica'. *Mediterran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4, 221-238 以及 P.S.Horky (2021). 'Archytas: Author and Authenticator of Pythagoreanism'. In Constantinos Macris, Luc Brisson & Tiziano Dorandi (eds.), *Pythagoras Redivivus: Studies on the Texts Attributed to Pythagoras and the Pythagoreans*.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 141-76.

<sup>11</sup> 英文相关著作通常将这里的 *logoi* 翻译为论述或陈述 (accounts, statements)，但 Szlezák 的翻译是 Begriffe (概念)，并且在相关注解指出 *logoi* 是古代注解者对于范畴的常见替代性说法。

<sup>12</sup> 关于这一文本的背景，参 Michael J. Griffin, *Aristotle's Categorie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Oxford classical monograph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对于这一文本的最新讨论，参 M. Hatzimichali 'Pseudo-Archytas and the Categories.' In: J. Bryan, R. Wardy, J. Warren eds. *Authors and Authorit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162-183. Phillip Sidney Horky 正在制作一个新的英译本，会收录在资料集 *Pythagorean Philosophy: 250 BCE-200 CE* 之中。

这本教职论文已经十分亲和柏拉图研究中的图宾根学派，尽管这里其关注的首要对象是普罗丁，而非柏拉图本人。在这部有方法论倾向的专著中，Szlezák 反对传统看法将普罗丁哲学视为一种六经注我的尝试，而主张通过严肃考察普罗丁自身对于之前哲学传统的理解，重新定位他与之前哲学传统的关系。Szlezák 尤其强调需要严肃对待普罗丁仅仅自诩为柏拉图解释者的自我定位，主张不仅这一定位是真诚的，并且确实可以从柏拉图对话录中找到普罗丁核心理论的来源。这里，Szlezák 的关注点是努斯，包括它的源起、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与太一和灵魂的关系。尽管不排除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其《形而上学》lambda 卷——的影响，但 Szlezák 努力论证普罗丁如何从《理想国》（尤其是其中的日喻和第十卷）以及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本原学说的记载中发展出自身的理论，并且用来解决柏拉图体系内部遗留的问题。从理论上讲，Szlezák 与图宾根学派的创始人 Hans Krämer 一致，认为柏拉图的口传学说（本原理论）与对话录具有某种一致性，并且被保留在亚里士多德以及后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中。但他在这本书中反对 Krämer 归给普罗丁过高的原创性，而试图将后者定位为忠实的柏拉图阐发者。

值得一提，在这本专著发表前后，Szlezák 已经发表了数篇发展和辩护图宾根学派柏拉图解释的重要作品，例如关注柏拉图《书简七》与普罗丁师门守密协议的论文《普罗丁和阿莫尼乌斯的秘密学说》（“Plotin und die geheimen Lehren des Ammonios”，in *Esoterik und Exoterik der Philosophie. Beiträge zu Geschichte und Sinn philosophischer Selbstbestimmung*, Rudolf W. Meyer zum 60. Geburtstag, ed. by Helmut Holzhey and Walther Ch. Zimmerli (Basel: Schwabe, 1977), 52-69)，关注柏拉图对话解释学与口传学说关系的《对话形式与内传主义》（*Dialogform und Esoterik*，载于 *Museum Helveticum*, XXXV (1978) 18-32）以及对于传统柏拉图解释批评的长篇书评论文《柏拉图解释问题》（“Probleme der Platoninterpretation”，in *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 CCXXX, 1978, 1-37）。

Szlezák 曾提及在苏黎世时期，早在提交教职论文之前，Burkert 已经发现了他亲近所谓图宾根学派的倾向，并且警告这可能会危及他的职业。以自身作为例证，Burkert 表示尽管很早就构思好了《杀戮之人》（*Homo Necans*）这本专著，但“出于战略考虑”将其推迟到 1972 年才出版，即自己获得苏黎世的教授席位之后。因为这本书并不符合传统语文学的规范，而是一部结合了动物行为学、考古、宗教史的异类作品<sup>13</sup>。但 Szlezák 表示，相比于未来的职业，他更关心一种可行的柏拉图解释方法<sup>14</sup>。这一小插曲也生动解释了为何 Szlezák 越来越用力于柏拉图研究，尤其是其解释学。凭借 70 年代后期一直到 1985 年的一系列发表，尤其是专著《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对早期和中期对话的解释》，他逐步成为图宾根学派的第三号代表人物，仅次于 Hans Krämer 和 Konrad Gaiser，尽管从学术履历来讲，他并没有长期在图宾根圈子活动。不管如何从学术上评价 Szlezák 的观点和立场，至少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它至少没有威胁他的职业，甚至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他后来的工作。

1983 年，在出版教职论文的四年后，Szlezák 从苏黎世转到维尔茨堡，接替 Bernd Manuwald，成为维尔茨堡大学的古典希腊语教席教授。而 1988 年 Konrad Gaiser 的意外去世再次改变了他的职业轨道。出于延续传统的需要，1990 年

<sup>13</sup> Burkert 在 *Homo Necans* 的开篇已经提及传统语文学认为不应该对于超出文本之外的事物有所言说，而另一方面，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又倾向拒绝历史眼光。但自己的这部作品正是要试图克服这种鸿沟，从语文学出发，但结合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解释来理解古代宗教，它既在文本之中，又超越传统文本。事实上，本书的德文版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经典地位同样有赖于 1983 年英文本的推出。

<sup>14</sup> 参 T. A. Szlezák (2018). ‘Walter Burker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62(1), 116-9.

Szlezák 被图宾根大学召唤成为 Gaiser 的接替者,任古典学希腊语方向讲席教授,并且主持柏拉图档案馆 (Platon-Archiv) 一直到 2016 年退休。

不同于他的前辈 Krämer 和 Gaiser, Szlezák 的柏拉图研究主要关注对话录的解释学,这尤其弥补了之前二者在对话录解释上的相对薄弱。在他之前,人们常常认为所谓图宾根学派的理论割裂了对话录和所谓的柏拉图内传理论,认为前者甚至并不代表柏拉图的真正思想,仅仅是吸引年轻人进入学园学习哲学的劝勉和“广告”,而学园内部的口传理论才是柏拉图真正的学说。与之相对, Szlezák 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恢复了对话录的价值,尤其它与口传学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不仅如此,他甚至论证以这样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阅读对话录,并且正面看待里面刻意的省略和疑难 (*aporia*) (参《读柏拉图》附录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退休后仍旧笔耕不辍,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柏拉图:古代的大思想家》(*Platon: Meisterdenker der Antike*. München C.H. Beck, 2021) 是写给一般读者的通识性作品,相比于精巧的《读柏拉图》,本书更为系统,它不仅仅关注如何阅读和解读柏拉图,也关注柏拉图凭借对话表达了怎样的理论。当然对于熟悉 Szlezák 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本导论从学理上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推进。与之相对,另一部新近出版的论文集《希腊文学和哲学论集》(*Aufsätze zur griechischen Literatur und Philosophie* (= *International Plato studies*, Bd. 39). Academia, Baden-Baden 2019) 汇集了 Szlezák 各个阶段的代表性论文,对于专业读者而言,这或许是对其整个研究生涯更好的总结。

## 4

除了柏拉图,自从博士论文以来, Szlezák 也始终关注亚里士多德及其传统。尤其在八十年代,他在第九届和第十届“亚里士多德研讨会”(Symposium Aristotelicum) 论文集中分别发表了《〈形而上学〉 $\alpha$  卷的统一性和结构》(“Alpha Elatton. Einheit und Einordnung in die *Metaphysik*,” in: *Zweifelhaftes im Corpus Aristotelicum. Studien zu einigen Dubia*, ed. by Paul Moraux and J. Wiesner, Berlin: De Gruyter, 1983, 221-259) 以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N 中学园派本原理论的不完整性》

(*Die Lückenhaftigkeit der akademischen Prinzipientheorien nach Aristoteles' Darstellung in Metaphysik M und N*,” in: *Mathematik und Metaphysik bei Aristoteles*, ed. by Andreas Graeser, Berner R., Bern: Haupt, 1987, 45-67)。由于这些工作,他也一度被委任负责德语新亚里士多德全集译注系列中 (*Aristoteles, Werke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形而上学》的翻译和注释。

想起大约 2008 年的时候,我曾问他最佩服的古希腊哲学学者是谁,他的答案既不是任何一位柏拉图学者,也不是耳熟能详的 Diels 或 Zeller,而是“Hermann Bonitz”, 19 世纪最为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之一。我说:“是因为他的《亚里士多德引得》么?”他答道:“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的《〈形而上学〉注释》。”我说:“我不知道他还写过这样的作品。”他笑道:“由于 Bonitz 这本书由拉丁文写就,而大家现在只看英文的 David Ross 注释本。但你只要对照一下,就知道 Ross 从 Bonitz 里面学到了多少东西。”我当时没有怎么认真读过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更所知甚少,因此对于 Bonitz 和 Ross 的异同很难有任何直观的感受。不过,对话中 Szlezák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偏爱是溢于言表的。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他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一人详注《形而上学》这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他退休后,《形而上学》的译注被重新分配给了四位中生代学者 (Christof Rapp、Christoph Horn、Michael-Thomas Liske 以及 Tim Wagner),但迄今仍旧没

有任何一卷问世。唯一让人欣慰的是, Szlezák 作为先期准备工作的《形而上学》德译在 2003 年出版 (*Aristoteles, Metaphysik. Übersetzung und Einleitung*, Akademie-Verlag, Berlin 2003), 这一译本可能仍旧是目前德语区最好的《形而上学》译本。由于它十分贴近原文, 也尤其适合愿意参照希腊语原文的读者使用。Szlezák 曾告诉我, 尽管放弃了《形而上学》的注释, 他并没有放弃对亚氏的研究, 尤其想写一部关于《物理学》的专著。然而, 由于他的忽然离世, 这一出版亚里士多德研究专书的计划就只能永远化为遗憾了。

在出版《柏拉图晚期对话录中的辩证家形象》(2004) 之后, 事实上, Szlezák 对于图宾根传统的贡献就更多地在于编辑组织而非原创性的独立研究上。在这一时期, 他组织编辑的文集包括《沙德瓦尔特与二十世纪的希腊学》(*Wolfgang Schadewaldt und die Gräzistik des 20. Jahrhunderts*, Hildesheim: Olms, 2005)、《康拉德·盖瑟: 论文集》(*Konrad Gaiser: Gesammelte Schriften*, Sankt Augustin: Academia-Verl., 2004) 和《柏拉图式的哲学活动: 克莱默祝寿集》(*Platonisches Philosophieren: zehn Vorträge zu Ehren von Hans Joachim Krämer*, Spudasmata, Bd. 82. Hildesheim: G. Olms, 2001)。此外, 在 Walter Burkert 多卷本的论文集中, 他也负责编辑了其中的哲学卷 (Walter Burkert: *Kleine Schriften VIII: Philosophic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8)。

当然, 尽管功劳巨大, Szlezák 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并非没有遗憾, 这主要涉及他对于柏拉图档案馆 (Tübinger Platon-Archiv) 的领导。该档案馆建立于 1970 年, 实则是接续了 Georg Picht 在 40 年代的工作, 本意是对柏拉图用词进行系统和彻底的归类整理, 出版类似《早期希腊史诗辞典》(*Lexikon des frühgriechischen Epos*, 1955-2010) 这样的大型工具书。这个项目在“德国研究协会”(DFG) 的支持下, 初期工作已经完成——包括 750 个卡片盒, 约有 60 万张卡片, 每张卡片记录一个词汇以及五行左右的上下文 (类似的卡片盒在巴伐利亚科学院的 *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工作室也可以看到)。但早在七十年代, 馆长 Konrad Gaiser 已经放弃编订辞典的计划, 而将工作重心转到收集柏拉图文献和推进柏拉图传统相关, 尤其是概念史的研究上。八十年代时, 他组织了《柏拉图文献补遗: 间接的柏拉图流传文本》(*Supplementum Platonicum. Die Texte der indirekten Platon-Überlieferung*) 系列丛书, 其试图收集古代关于柏拉图生平和口传学说的所有文献并加以注释, 共九卷。1988 年 Gaiser 出版了第一卷《斐罗德姆的学园志: 关于柏拉图 and 老学园的两部赫库兰尼姆纸草》(*Philodems Academica: Die Berichte über Platon und die Alte Akademie in zwei herkulanensischen Papyri*)<sup>15</sup>。然而, 在 Szlezák 接过档案馆馆长的职位后, 这套书就再也没有推进, 档案馆也未曾提出任何替代性的研究或出版方案。Karl-Heinz Stanzel——他是我当时的希腊语老师之一, 也是 Szlezák 常年的助手——的博士论文《柏拉图所言: 在柏拉图名下流传的格言》(*Dicta Platonica. Die unter Platons Namen überlieferten Aussprüche*) 本是为这套丛书量身定做, 但他最终未能正式出版。在我当学生的那些年, 所谓的柏拉图档案馆位于古典系最内部的地下室, 平时并

<sup>15</sup> 所谓的 *Academica*, 来自 Gaiser 命名, 当前更通行的叫法是《学园派引得》(*Index Academicorum*), 后者回溯到 Bücheler 编辑的版本 *Academicorum philosophorum index Herculanensis* (Greifswald 1869)。原书是斐罗德姆编纂的哲学史的一部分, 目前存有 两卷纸草, 分别是 PHerc 1021 (大约有 49 栏残存) 和 PHerc 164 (存有 33 个碎片)。根据学者的推测, PHerc 1021 是在公元前 70 年左右写成, 是斐罗德姆的初稿。PHerc 164 是前者的修订版。Gaiser 并没有编辑注释全书, 而是节选了其中涉及学园派的一部分, 即 PHerc 1021 的 49 栏中的 26 栏。Gaiser 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意识到 PHerc 1021 中的 M-Z 栏 (保存在牛津的复写本中) 应该是书写在纸草背面, 需要以逆序阅读和整合, 并且他利用自己对于柏拉图传统的熟识大胆给出了一些有趣的文本推测 (conjectures)。对于这两卷纸草更为完整的编辑和注释, 参 T. Dorandi, *Filodemo. Storia dei filosofi. Platone e l'Accademia (PHerc. 1021 e 164). Edizione, traduzione e commento*, Napoli 1991 以及 Kilian Josef Fleischer, *Philodem, Geschichte der Akademie: Einführung, Ausgabe, Kommentar*, Brill 2023。

不开放。从学生的眼光看，那里神秘但又似乎名存实亡。仅仅在硕士毕业笔试的时候（2011），我一人被关在档案馆翻译了四小时希腊语，才真正看到了里面的藏书和卡片。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问 Szlezák 为何 *Supplementum Platonicum* 这套书不再继续，实在非常遗憾。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不是遗憾，而是耻辱！”他接着解释，核心问题是拿不到研究资助，从而招不到研究人员启动项目。对于古典系的“穷困”，我个人是有亲身体会的。每学期开学时，系秘书都会不断提醒学生除了学校惯例的注册之外，也要专门到古典系登记，以便他们统计人数向学校争取经费。甚至在古典系内部，相比于有上百学生主修的拉丁方向，整个希腊方向听说也就只有三十多主修的学生。而除了教授和秘书，古典系的不少教师都没有办公室。例如主要负责高阶语言教学的 Beate Noack 老师——她兢兢业业任教多年，每学期负责 4-6 门课——却始终只在系图书馆分了一个小桌。由于经济的拮据，每次课程她甚至不得不先收每人 2-3 欧的复印费，然后期末给出精确统计同时退还剩余的钱。

在研究、编辑和出版之外，Szlezák 也是柏拉图各种活动重要的组织者。一方面他是国际柏拉图协会（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创建者之一，而且常年组织 Heiligkreuztal 修道院的柏拉图读书班，学生遍及各洲，尤其以南欧和南美为多。



Heiligkreuztal 修道院外景





Heiligkreuztal 修道院的住宿内景

从 2008 到 2019 年，在 Heiligkreuztal 修道院的研讨会每年在冬季假期举行，涉及的对话录包括《斐勒布》（2008 年、2017 年）、《斐多》（2009 年、2015 年）、《理想国》VI-VII（2010）、《政治家》（2013 年）、《理想国》VIII-X（2014 年）、《蒂迈欧》（2016）、《卡尔米德》和《吕西斯》（2019）。这些会议他总是亲力亲为进行组织与联系，不断给参会者发送邮件确认行程、住宿和餐饮。我在 2012 年参与他和海德堡的 Jens Halfwassen 组织的柏拉图《会饮》讨论班，对于这种从上午九点一直讨论到晚上九点（持续两天半）的高强度课程印象很深。尤其当时 Szlezák 尽管年过七十，但晚课结束后，他还会继续跟一些同学转场聊天，丝毫不显疲态。读书班理论上要求每个参与者除了讨论之外，也需要根据提前划分的文本准备一个报告。他尽管不排斥系统化论题的报告，但总是强调细读文本的重要性。这里值得节选他组织《会饮》时的一封群发信（2011 年 11 月 15 日）：

“关于论文：有人问是否也可以提交不包括分析文本具体章节的论文。一直以来，我们都允许这样的发言，也一直有这样的发言。你们可以自由选择题目[...]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专题报告都不能取代惯常的文本报告。绝对有必要按照文本——其结构、思路，甚至文学特征——一步一步地仔细研读。[...] 如果我们放弃以前可靠而准确地解释文本的方法，那将是对我们自己的损害。”（我的节译）

5

2012 年初的《会饮》读书班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 Szlezák。不过除了邮件，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寄给我论文的抽印本，一直延续到我回国工作。2014 年，由于我转发给他 Burnyeat 和 Frede 关于柏拉图《书简七》的书稿（当时此书的电子版在正式出版前就流传出来），我们也邮件讨论了一阵这本书。我个人不是很被 Burnyeat 说服，但很好奇他会如何看待 Frede 从整个书信题材出发的论证，同时，

我也表达了对 2015 年最初出版的几个书评的失望。让人惊讶的是，在 2016 年 2 月，Szlezák 发来了一份排版密集的书评草稿让我评论。我连忙打开文档，翻看前两页，读到他继续畅谈图宾根学派的《书简七》解释，不禁又有些失望，感觉老先生似乎过于执着自己的学术导向，而忽略了评论对象的根本关切。不过在耐心读完全文之后，我发现这篇书评仍旧包含一些洞察，尤其是对于伪书标准的讨论和文本细节的批评远远好过世面上一些不痛不痒的赞扬。我连忙写了一封回信，建议他最好区分所谓图宾根学派关于《书简七》的争议和这一书信的真伪问题，而这一书评应该用力于后者而非前者。他之后也大度地表示接受我的建议，删除了评论中的相关内容。后来这篇书评发表在 2017 年的 *Gnomon* 上（“Review of Myles Burnyeat and Michael Frede, *The Pseudo-Platonic Seventh Letter*, Dominic Scott (ed.), Oxford, *Gnomon* 89, 311–323）。它和纳富信留新近出版的论文<sup>16</sup>，在我看来，是对 Burnyeat 和 Frede 此书最有价值的回应之一。

我与 Szlezák 最后一次通信是 2022 年的新年。由于新冠的流行，我颇为担心他的健康，但他回信表示仍旧在正常工作，并且要再次寄书给我：除了上文提到的柏拉图新导论，也包括一本荷马导读：《荷马或曰西方诗的诞生》（*Homer oder Die Geburt der abendländischen Dichtung*. Munich: C. H. Beck, 2012）。后者是写给一般读者，包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分析、接受以及和东方诗歌的比较。他在信中还一再叮嘱，如果我发现作品中的错误或者有不认同的地方，一定写信与他明言。由于时间关系，我一直未能拿起这本书真正开始阅读，但它一直提醒我，Szlezák 尽管是一位著名的柏拉图研究者，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属于我们当下狭义的古代理学哲学研究圈。相比于当前由哲学学者主导的古代理学哲学研究界，Szlezák 的学问则更具有过去时代的欧洲的印记，属于古典语文学仍旧与古代理学哲学密切联姻的时代，或许是这一时代的最末期。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他的柏拉图研究更关注方法而非内容，更关注形式而非论证；甚至尽管他极力批判解释学，但他的进路实则极具解释学特征。他能够敏锐地——通常也是正确地——看到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表达的反讽与保留，但有时又过于天真地相信引入理念论或本原理论足以在哲学上化解这种反讽背后的各种哲学疑难。敏锐的读者不难看到，Szlezák 尽管捍卫柏拉图的理念论或本原理论，但他辩护的是它们在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位置，而非这些理论自身的合理性——甚至 Szlezák 的著作从来没有表现出他真正关心后者。这或许是因为 Szlezák 的哲学英雄是柏拉图、荷马和索福克勒斯，而非 David Lewis 和 Saul Kripke。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除了讲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几乎每年也讲授荷马或者希腊悲剧。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以来，Szlezák 一直间或发表跟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相关的各类论文<sup>17</sup>，只是他这方面的专长被他作为柏拉图专家的身份遮盖了。记得 2008 年一位师兄告诉我，他本提交了关于荷马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但不被现任教授看好，被迫要改做希腊化时期诗歌。我将与 Szlezák 提及此事，他笑着说：“他更应该找我，我非常热爱荷马，绝不会逼他换题。”

2024 年 1 月 26 日  
北京

<sup>16</sup> Noburu Notomi (2022). ‘Plato, Isocrates and Epistolary Literature’. *Plato Journal* 23:67-79.

<sup>17</sup> ‚Sophokles‘ Elektra und das Problem des ironischen Dramas’, *Museum Helveticum*, XXXVIII (1981) 1-21; ‚Zweiteilige Dramenstruktur bei Sophokles und Euripides‘, *Poetica*, XIV (1982) 1-23; ‚Mania und Aidos. Bemerkungen zur Ethik und Anthropologie des Euripides‘, *Antike und Abendland*, XXXII (1986) 46-59.